

超越外交史：从外交史批判运动 到新冷战史的兴起*

牛 可**



三位冷战国际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中）、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系教授文安利（Odd Arne Westad，左）、曾任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校长的霍根（Michael J. Hogan）。

* 本文是在王立新教授的提议和推促下写出，他并曾就本文予以详细商讨评议；初稿亦蒙刘北成、牛军、李剑鸣、于铁军、顾杭、刘青等师友阅评指正，在此谨表谢忱。

** 牛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提 要:

本文试图从学科文化的角度把握近几十年来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演进和转型的总体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近期“新冷战史”的学术史源流和学术思想特性。在冷战前期进入高峰期的外交史具有单一、封闭、板结的总体特性,这种状况在1980年代以后持续推进的具有“学术运动”风貌的学科批判和反思中被打破,导致以认识论多元主义、跨学科和研究空间扩展为方向的学科整体转型,促生了新的、更趋近美国历史学整体趋势的研究格局和学科文化。“新冷战史”的基本特性是对常规外交史的超越和扩张的冷战观,它的存在和演进以多元主义的新学科文化为基本智识条件。

关键词: 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 外交史批判运动 新冷战史 学科文化

一、高峰期的美国外交史:成功而板结的学科

在19世纪以来形成的专业化历史学各分支中,无论就其起源还是特性而言,外交史都是最符合“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y)”样式的一支。它是以官方档案为研究基础的历史学,是尊奉主权国家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因而往往也是“民族主义的”或“种族中心论”)的历史学,是把政治因素作为历史的基干、本质上从属于政治史的历史学,是注重政府、政治精英和“治国术(statecraft)”的历史学,是关注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学,是叙述的历史学,是以探究基层经验事实和历史细节为能事的历史学,是信奉“排列得当的事实本身就能解释”的历史学,是自觉地与“思辨哲学”拉开距离、又本能地厌恶理论的历史学。它也是经常以“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科学”自命(也被别人贴上这些标签)的历史学。这样的历史学是现代专业化历史学的原初形态,也曾经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主流正宗、甚至是完善形态(只是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少)。自20世纪初以来,这样的历史学经常被称为“传统史学”和“常规史学(conventional history)”,也经常地成为各种来路的“新史学”所憎恶、批判、反思和反动的对象,其中年鉴派对政治史、外交史尤其敌对;而美国特纳、比尔德牌号的“新史学”主张也天

然地抵牾着这样的历史学。^①

在美国，在由德国传播而来的学术专业化潮流中，历史学于19世纪晚期正式确立学科地位，稍晚外交史也成为历史学内的一个专门领域。通过简化和误读兰克（Leopold von Ranke）而生成的“兰克史学”模式主导着美国的历史学，而美国外交史也自始具有比其他历史学分支更浓厚的“兰克史学”或者“科学历史学”的本色。外交史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也随着20世纪中叶美国高等教育的迅猛扩张和学术专业化的深入演进而成长壮大，至1960年代它已成为美国历史学家族中的显赫成员，进入一段后来不曾再现的高峰期。^②而高峰期的美国外交史在它的外部环境的关联方面，以及学科内部格局方面都呈现出特定的性状。

外交史的繁荣与美国的“国际化”进程密切相关。这一进程中的重大国际冲突，其中又特别是二战和冷战，在政府需求和公共受众兴趣方面给外交史提供了额外的刺激。在二战和冷战初期政府情报和决策部门对专业化学术知识的动员、利用中，外交史是殊为突出的一例。“毫不奇怪，最热忱、最直接地支持和捍卫美国冷战事业的是外交史学家共同体。”^③反“极权主义”的国际斗争赋予美国外交史家以巨大的道德使命感和对本学科公共效用的充足信心，他们把自己的工作与美国的国家使命，与“自由的赐福”紧密地联系起来。^④在此可以看到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外交史的高峰期与冷战前期意识形态共识（以及作为其学术表现的“共识史学”）的高峰期在时间上重合；美国外交史具有程度远甚于诸多其他历史学分支的“当下关切（presentism）”；冷战（特别是冷战的起源）很快占据了外交史的中心地位。

① 参见 Saho Mastsumoto, “Diplomatic Histor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lly Boyd (ed.),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Writing*, London,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1999, pp. 314-316; Oscar Handlin, etc.,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Atheneum, 1967, pp. 18-19; Jacques Le Goff, “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 *Daedalus*, Vol. 100, No. 1, Winter 1971, p. 1; 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2页。

② 参见 Alexander DeConde,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in Transformation*, AHA Pamphlet 702,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76, pp. 5-12; Ernest R. May “Emergence to World Power,” in John Higham (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1961, pp. 180-196.

③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8, p. 305.

④ 外交史对冷战政治的拥护突出地体现在贝米斯（Samuel Flagg Bemis）在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演讲上，见 Samuel Flagg Bem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7, No. 2, January 1962, pp. 291-305.

本来，自1920年代关于美国加入一战的原因的争议开始，“修正派”——即针对主流的、维护官方立场的历史解释的批判性学派——就是美国外交史学术中一再出现的现象；但正是在外交史的高峰期，冷战共识抑制了后者而相应的助长了前者的强势地位。“民族主义学派”也就主宰了高峰期的美国外交史。^①

战后前期，美国社会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潮流与历史学中反对道德和认识论相对主义、“重建客观性”的学科智识潮流并行协进，外交史当然不自外于这种有深刻暗合关系的双重潮流。^②虽然客观性共识在美国历史学全学科范围瓦解的长期趋势并未就此逆转，但“客观性”信念在外交史从业者中仍特别强固地存在。^③这种情况显然与外交史的档案研究偏好有关。历史学对客观性和确定性的信念向来与倚重原始资料的技术倾向相辅相成，而美国外交史学家与其欧洲先辈一样有档案偏好，总是致力于使其研究工作密切跟随官方档案的公布进程。美国政府档案体制开放程度传统上较欧洲国家更高，外交史中也就更多出现“档案淘金热”。档案资料方面的“有米为炊”的条件促成侧重美国方面的对外政策史和冷战史（特别是冷战起源研究）的繁荣，^④也给学科的学术合法性、专业认同和专业信心提供了充实的基础。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方面的外部原因之外，档案研究的可行也是美国外交史具有特别突出的“当下关切”的学科特性方面的一个原因。

对官方档案的倚重具有助长对官方立场和动机的同情与肯定的潜在效应。而这又与19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外交史的另一走向相关，即它与当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兴盛的“现实主义”学派的汇流。凯南（George F. Kennan）、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美国版“古典”现实主义对推动美

① Walter LaFeber, "The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4, October 1995, pp. 1022 - 1024.

②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p. 281 - 309.

③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specting Difference and Crossing Boundar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17 - 18.

④ Geir Lundestad, "Moralism, Presentism, Exceptionalism, Provincialism, and other Extravagances in American Writings on the Early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3, No. 4 Fall 1989, p. 541; 如雅尔塔会议的档案在1950年代中期即公布。当然，冷战时代的保密规定也在限制和推延档案的公布。见 Wilbur Edel, "Diplomatic History—State Department Styl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6, No. 4, Winter 1991 - 1992, pp. 696 - 700.

国走出孤立主义发挥着特殊作用，也为外交史提供了思想核心和学科整合的观念平台，并赋予它以前所未有的分析上的系统性和清晰性。^①现实主义理论立基于“国家利益”，措意凝思于政治因素、国家和国家间权力关系（“均势”），具有注重特殊性和历史经验的思维偏好，强调外交和国务活动的个人化和“艺术”性质，这些理论主张和认识论取向一方面与民族国家本位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格局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另一方面，也总是能让外交史安于依赖政府档案、关注政府政策和活动的常规工作套路。这样外交史偏重对美国对外政策史单方面的研究，因而更多地嵌入美国的“国史”（即“美国史”）系统，而在较小程度上与当时在美国迅速兴起和壮大的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地区研究”）相对接、汇合。

概言之，高峰期的美国外交史呈现出如下要素和特征：反极权主义和美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客观性的诉求和信念、现实主义的思想路线、档案研究的专业技艺、“当下关切”之下冷战研究的繁荣。而这些特性是以有机的、内在的方式（尽管有的彰显有的隐晦）相互关联着的。以现代国际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战争和危机事件以及相关决策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个传统悠久的学科成为冷战年代里的美国显学。它具备成熟和成功的学科的一般外在标志：丰硕的研究成果、众多的大学教席和在大学课程中的稳定地位、在学科领域内外广受尊敬的领袖人物。^②1967年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SHAFR）成立，此时这个学科（更准确地说是“次级学科”）展示出一派成功而板结的样貌。

在学术专业化的特定阶段，“对越来越少的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多”经常成为知识生产的第一律令。次级学科和专门研究领域独立性增强，倾向于建立自足而稳固的认识论取向、工作路径和研究议程，倾向于维护具“孤立主义”特性的专业认同方式和学科文化，分科细化和学科壁垒固化的趋势要强于学科间交流沟通和相互影响的趋势。高峰期的外交史大致正处于这样的学科发展阶段。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中“常规范式”（借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著名概念）的自足性和强韧度不同，与其他学科的沟

① 弗兰克·宁科维奇：《范式失落：文化转向与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牛可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20—121页。

② 1956至1961年间有四位外交史领袖均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德克斯特·珀金斯（Dexter Perkins, 1956）、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 1957）、伯纳多特·埃弗利·施米特（Bernadotte Everly Schmitt, 1960）、塞缪尔·比米斯（Samuel Bemis, 1961）。

通交流的频繁程度、对外部智识环境的敏感和开放程度也有不同，但高峰期的美国外交史显然较历史学其他分支具有更强的单一、稳固和封闭的学科特性和学科文化。^①它是一个“学科”，但也几乎是单一的学派。按照某种以“专业化”为绝对律令、以学科的现存性状为本位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学术领域有更充沛的“路径依赖”的本钱和条件，维持原有格局的积累性学科演进道路本为自然和应然之势。但这样的学术也不免使人拿它和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封建行会做个类比：“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②和以往“工业阶级”的历史命运一样，外交史总体上稳定、自足和自信的状态不可能也没有延续下去。

二、裂隙、断层线和批判的先声

正如后文所述，常规外交史形态主宰美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局面之终结和新冷战史的兴起，是1980年代以来外交史学科内的批判运动的直接后果。对常规外交史的批判固然是在1980年代以来才蔚然成风，呈现出全学科范围内思想运动的大势；后来人们对这一批判运动的回顾亦多从1980年代初——特别是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1980年的著名文章（见后文）——谈起，给人以这场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印象。然而，学术思想史上某一阶段的现象事物总是可以追踪溯源到更早时期，在美国外交史稳固、板结的大致情形之中的确也可以发现后来大变局的某些肇因、端倪。就其大端而言，有两点必须提及。

其一，在学术正统之内，有些学者已经在各自实际的研究工作中，以不同的自觉程度和不同的力度，在某一个或甚某几个方面，出离乃至冲击固有的外交史工作模式。比如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所说的“哈佛国际主义者”，这一人多势众的群体力行和倡导多国档案研究，又自觉地联合和吸收地区研究的资源，其研究已大致脱离美国“国史”框架而初具“国际

^① 有知识社会学家指出，在各个学科中，历史学是其次级学科相互之间的思想联系最为有限的学科之一。Christopher Jencks and David Riesman, *The Academic Revolution*,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2002, pp. 523 - 530; 而另一位研究学科和跨学科问题的学者却将历史学列入那些具有内在的整全（synoptic）和综合特征，内部结构较为松散，但总体上对其他学科的概念思想更为开放的学科之一。Julie Thompson Klein, *Crossing Boundaries: Knowledge, Disciplinarit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Charlottesville, VA: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6, pp. 38 - 40.

^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4页。

史”的气象。而“国际主义者”中又有一些人的研究指向了非国家行为体以及社会和经济力量。尤其是哈佛集团的领袖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一向被认为具有超越常规外交史的研究旨趣。^①厄内斯特·梅（Ernest May）也指出，1950和1960年代一些年轻学者做出有限的超越常规外交史的努力，有人借鉴政治学里的决策研究，更有人分别注重对外政策中经济、社会因素乃至心理、观念和信念的影响。^②说来，“民族主义史学四大家”中有两位都在实际上“越过了外交机构的围墙”，裘里斯·普拉特（Julius Pratt）对大范围的社会运动和群体观念感兴趣，托马斯·贝利（Thomas Beiley）则更做出关于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影响的著名研究。^③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主流学术内部缓慢生长出来的异质因素，它们的存在和成长会在长期对学科产生局部的分化和松动的效应。其中某些趋势更在后来的外交史批判中被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并成为新外交史、新冷战史研究的构成要素。

其二，影响较前一项更为重大深远的是1960年代以来威斯康辛学派的兴起壮大。威廉·威廉斯开创和领导的这个左翼批判性学派承接比尔德进步主义史学的“经济解释”路径，又糅合了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激进民主传统的一些思想要素，致力于揭示美国对外政策的扩张主义特性，重视探究驱动美国扩张主义的国内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这个学派一方面对冷战意识形态、“共识史学”和外交史中的现实主义思想内核构成对抗，另一方面它天然地具有超越常规外交史的问题意识和认识论取向，有意超越对事件、人物的叙述史模式，也对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资源（首先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抱以更加开放、亲近的心态。越南战争引发的国内政治争议为它的壮大提供了契机，它也乘势在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研究方面扩充地盘，开创了自己的

① Michael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6, no. 1, Winter 1992, pp. 130 - 134. 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也曾指出威廉·兰格等外交史家的工作与美国的欧洲史研究相互交融，并对后者作出突出贡献的情况。Higham,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 1965, pp. 271 - 272. 关于威廉·兰格治学视野广阔、多面复杂的特性，见 Peter Paret, "Assignments New and Ol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6, No. 1, February 1971, pp. 119 - 126.

② Ernest R. May, "The Decline of Diplomatic History", George Athan Billias and Gerald N. Grob (eds.), *American 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411 - 413.

③ Thomas A. Bailey, *The Man in the Street: The Impact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cmillan, 1948, Walter LaFeber, "The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4, October, 1995, pp. 1023 - 1024.

优势领域。在经过研究相对单一的早期阶段之后，这个学派继续演进分化，其中它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支脉试图开发更复杂平衡，也更具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和议程。威斯康辛学派（“修正派”）“在美国外交史恢复了一种健康的张力”（亨特语），又特别“造成冷战史的多面化”（佩特森语）。^①如果说主流派内的异质因素生成学派内的局部裂隙，则威斯康辛学派恢复了外交史中主流派与“修正派”并存对峙的局面，造成横亘全学科的巨大断层线，初步打破了该学科单一板结的总体状况。

上述两方面的发展是1980年代以后外交史批判运动的基本背景，但或许是由于正统派和修正派之间在具体历史问题解释（如美国扩张主义、冷战的起源、早期美国外交以及越南战争等）的论战调动了双方更多的精力，又或许是因为两个学派（加上后来出现的“后修正派”）都不着意清晰表述和论证其学理前提，相互之间没有起码的借以共同讨论的“思想框架”，从而“各自与历史对话而不相互对话”，^②的确在1980年代前涉及认识论、方法和学科总体格局的批评、反思的确稀疏寥落。^③的确，实际研究中的新学术因素和主张未必总是得到清晰响亮的表达，更未必以批判的形式表达。不过，1970年代以后，也已经可以听到为数很少、但也掷地有声的批评、异议。这些声音与学科主流的庞大存在相比显得孤零微弱，难以带动催生新的学科文化，但它们与后来大规模外交史批判运动声气相接，可谓后者的缘起和先声。可以理解，来自修正派的批判比正统派更激烈、鲜明。由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往注意不多，在此值得假以稍多篇幅介绍1970年代初的三个批判文本。

在1970年出版的《美国历史学现状》——该书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于上年组织的旨在考察美国历史学现状的系列会议的论文结集——一书中，不同寻常地同时出现两篇关于外交史的极具批判锋芒的文章。威斯

① Jerald A. Comb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255 - 258, pp. 277 - 281, pp. 332 - 333; Michael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pp. 123 - 128; Thomas Paterson, "Cold War Revisionism: 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1, No. 3, June 2007, pp. 387 - 395.

② 关于后一点见 Thomas J. McCormick, "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Synthesis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0, No. 4, December 1982, p. 39.

③ 少数外交史学史通论著作之一：Jerald A. Comb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即给人这种印象。

康辛学派的新锐成员托马斯·麦考米克(Thomas McCormick)指出,外交史是美国历史学中最亟须批判性反思的一个领域。它比其他任何历史学分支都更受制于狭隘的“当下关切”和“国史偏向”,也更顽固地抵制来自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刺激和启发,已日益陷入沉闷贫瘠的状态。它的概念和思想工具简单含混、大而不当,缺乏分析力度。它过度关注孤立的事件,特别是危机事件,相应的缺乏对事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和长期历史脉络的思考,也缺乏有精确性和系统性的问题意识。它处于一种类似欠发达单一产品经济的“均衡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研究技术和质量能不断提高,传统外交史特有的“思想紧身衣”还是难被挣脱,将继续阻滞学科的扩张和多元化。针对当时正统派中有人提出外交史进步和突破应以多国档案为主要途径的主张,麦考米克还指出,多国档案固然有助于修补以往外交史研究的褊狭性和单一美国视角,但如果把视野局限于精英决策的既有模式下,则多国档案研究的效果也甚为有限,无非是把“一个官僚对另一个官僚说了什么(what one clerk said to another)”的样式转变为“一群官僚和另一群官僚的对话”。所以,多国档案无法构成研究方法的革新,而只不过是“传统的、狭窄的外交史的一种平面扩展”。麦考米克断言,外交史的出路在于将研究目标指向各国社会相互之间的总体影响,不仅考察政府精英和政治因素,也探究文化、经济和社会领域,同时既研究美国社会也研究别国社会;而这意味着外交史学家也应该成为社会史学家。总之,外交史必须全盘重构,否则将遭受“不可承受的惩罚”,沦为一个“返祖复古、密闭孤僻的残群遗落”。^①

同书中劳伦斯·埃文斯(Lawrence Evans)的文章更多着眼于外交史对公共生活的意义,指斥外交史在视野、方法上的褊狭陈腐使之无法履行帮助美国人了解世界的责任,言辞同样尖锐辛辣。它断言传统外交史是一个囿于积习的领域,存在“根本弱点”而不自知。特别是由于不能充分认识对外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外交史在自命专长的政策史研究上也是失败的。在迫切需要深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的当代美国,外交史对理解国际政治问题所作出的贡献“仅与神学相当,而比不上旅游”。它甚至不能发挥历史学相对于其他学科应有的天然优势,即对人的目标和动机的深入理解。作者暗示,这样的

^① Thomas J. McCormick, “The State of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Herbert J. Bass (ed.),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pp. 119 - 141.

学科即便消亡亦在情理之中。^①

上面两篇文章似乎没有激起太大反响，甚至似乎被遗忘了。而次年大致属于正统派、当时已成名的哈佛外交史家厄内斯特·梅也发表文章，在正统派内正式提出“外交史衰落”议题，则引起更多关注。梅认为，外交史领域当前最突出的趋势就是它“活力枯竭”，而这完全是由于外交史自身的原因，而不是时代风潮变换使得它的研究对象本身重要性下降所致。梅特别强调传统外交史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狭隘，指出其他各领域的历史学者早已不满足于将官方文件作为主要资料来源，普遍认为即便是对政治问题的研究官方档案的作用也很有限；而外交史运用资料的范围和方式一如旧制，仍像兰克那样全然依赖政府外交文件。他们仍然秉持一个古老的假设，即国际关系在根本上是由各国外交部门的正式关系所构成，认识不到“他们的档案只能说明关于公卿贵胄、而不是民族国家的事”。在颇为周详地考察了学科状况之后梅指出，无论对外交史加以多么宽泛的定义，当时国际关系史方面出现的真正重要和成功的研究大多都不能被算作外交史著作，而是具有国际和比较向度的经济史、思想史、社会史，或者是宽泛定义下的政治史。梅认为外交史的衰落无可避免，甚至可能走向解体，而有望取代它的是“国际史”。^②

其实，对外交史的异见和批评还可上溯至更早时期。此处有两例值得举出。笔者所见最早的外交史学科内部的批判专论是著名欧洲外交史学者雷蒙德·桑塔格（Raymond Sontag）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该文指出，19世纪以来，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复杂化，政府决策活动越来越难以独立于社会政治和公共舆论环境，但20世纪的外交史家“仍然是其科学方法的囚徒”，“继续像以往那样写作，似乎外交机构独立于外部世界而存在，又好像政治家是在自行其是”。该文进而提出，“外交史学家现在必须远远越过外交部门的围墙”。^③

另有一则学术轶事。1955年年初，以倡导跨学科研究为宗旨的美国社会科学的旗舰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着手筹备于次年夏季在杜克

① Lawrence Evans, "The Dangers of Diplomatic History",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 pp. 142 - 156.

② Ernest R. May, "The Decline of Diplomatic History", George Athan Billias and Gerald N. Grob (eds.), *American 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399 - 430.

③ Raymond J. Sontag, "On the Study of Diplomatic Histo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15, No. 2, June 1946, pp. 207 - 213.

大学举行高校间美国外交史讨论会，参加者多为青年学者。会议主席亚历山大·德康德（Alexander DeConde）在向 SSRC 方面陈述会议目标时称：“在当今许多学者看来，美国外交史一向在某种程度上拘泥于叙述方法，也拘泥于以官方文件和与外交直接相关的官员的个人回忆为基础的分析。观念、时代的思想潮流，以及社会力量无疑对对外政策有驱动作用，但却没有得到充分理解，而且没有在我们的研究产品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也许这种欠缺在某种程度上根源于研究方法的不足。”从往还信件中看，他的看法得到其他与会者的响应，而与会者提交讨论的文章多集中于观念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超越常规外交史的旨趣。^①

三、外交史批判运动阶段一：“批判反省和自我鞭挞的时代”

2004 年，迈克尔·霍根（Michale J. Hogan）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主席演讲中回顾学科历程时说，1980 年查尔斯·梅尔发表的著名文章开启了“外交史学家批判反省和自我鞭挞的一个时代”。^②美国学术史上，众说纷纭、横议鼎沸的景象比比皆是，但 1980 年代外交史领域那样激烈喧腾，又有一致舆论方向的全学科批判风潮确不多见。这场运动并非外源，激烈的批判都来自外交史学者自身。批判运动的情势显示，对外交史衰落的事实本身，对衰落的具体性状表现，对造成衰落的原因，对摆脱困境的出路，这个学科的从业者已具备相当程度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很大程度上是以往多年具体研究中积累的新学术因素的汇聚集合。批判的侧重和激烈程度因人而异，但这场运动中更醒目的是大体一致的思想方向和相互间的应和，而不是具体研究问题上的或者学派间的分歧和争议。威斯康辛学派兴起后，外交史在 1960 和 1970 年代曾经显而易见的学术派性在批评运动中似乎淡化了许多（当然当

^① SSRC Collection, Record Group 2, Series 1, Subseries 1, Box 5, Folder 34, “Seminar on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1956”,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Sleepy Hollow, NY, 引文自 Alexander DeConde to SSRC, January 26, 1955; 关于会议情况另见 SSRC, *Items*, Vol. 10, No.1, March 1956, p. 6。德康德后来提供了早期外交史批判的一个文本: Alexander DeConde, “What’s Wrong with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SHAFR Newsletter, Vol. 1, May 1970, pp. 1 - 16), 这篇文章和另一篇早期批判文章: David S. Patterson, “What’s Wrong (and Right) with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A Diagnosis and a Prescription” (SHAFR Newsletter, V. 9, September 1978, pp. 1 - 14), 笔者未能读到。

^② Michale J. Hogan, “The ‘Next Big Thing’: The F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8, No. 1, January 2004, p. 1.

时“后修正派”和修正派的相互批评还是随处可见的),少有站在单一派别的规范立场上的对攻式批判。特别突出的是,社会史观念的巨大影响终于全面抵达外交史领域。来自不同流派的成员,特别是重量级人物纷纷发言,学科的中心组织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和中心刊物(当时也是唯一的刊物)《外交史》杂志成为批判运动最主要的组织者和平台。批判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大量通览纵论学科状况的述评文章;与前一时期的“先声”相比,触及的问题更广泛深入,也有更全面、细致的学术史和研究现状考察作为基础(尽管遗憾的是,并没有系统清理外交史学史的大型作品在这一运动中问世)。各种情形显示,这并不是—般意义上的学术争鸣,而是改造学科格局、更新“学科文化”的思想运动。

梅尔题为《止步不前:美国对外关系史》的文章断言,外交史在过去虽然不乏具体研究成果,但总体上已处于“枯萎衰落”之中,在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素质读者中已沦为不被关心和尊重的“后娘养的(stepchild)”。梅尔特别点出:“兰克式注释仍构成(外交史)这门技艺的基础,而(外交史学家对)‘技艺(craft)’一词的使用是刻意的……(外交史的)这些东西都是传统技能(skills),成为传统固然不易,但无法把新成员吸引到这个学科里来。”梅尔在这里提到“技艺”、“技能”也是刻意的,他显然是要让“兰克史学”与现代学术形态之系统、严密、复杂,且以高度认识论自觉为基础的“方法论”形成对比,从而凸显外交史的低级、原始和落后。梅尔指出,这种外交史“缺乏理论的严谨性和方法论的创新”,“问题意识褊狭、视野逼仄、不熟悉外国语言和资料”,“抵制新技术”,几乎没有“从事集体事业和处于学术前沿的感受”。梅尔还认为,美国的外交史总体上缺乏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和相关社会科学门类的交往沟通,尤其对历史学内的社会史以及国际关系的政治学研究中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新兴趋势反应迟钝。关于这个学科的前途,作为“哈佛国际主义者”的梅尔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包纳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多个面向和因素的“国际史”。^①

梅尔的文章中隐伏着一个论说模式:它一方面列举评述了一些“更复杂精密、研究更充分、不那么褊狭和枯燥乏味”的研究,另一方面把这些研究作为个案异例在分析上排除出外交史学术的主体。也就是说,它用“简单化

^① Charles S. Maier, “Ma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80, pp. 355–387.

的工具”和省略差异完成了对美国版“兰克式外交史”的概念化和特性归纳，或者说塑造了一个关于美国外交史的“理想类型”；同时又竖立和凸显了一个二元对立的范畴：常规的、传统的、兰克式的、不可取的外交史和新类型的、变革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国际关系史。这是对外交史施以“病理诊断式”批评的概念基础。把对兰克史学的指认、批判和对新的史学主张的申述结合起来的做法久已有之（年鉴派即为先例），以往对外交史的认知和批评中，“兰克史学”的意象也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但在1980年代的外交史批判中，这个“兰克”意象与指摘、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如此确定、紧密地重叠在一起，频繁加以使用，却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兰克史学”是批判呈现为“运动”的一个条件：运动要有关于“敌对者”的明确指认和清晰“意象”，要有便于理解、流通和汇聚共识的标签语汇。正如后文提到的一些意见所显示的，对于学科的现状趋势，究竟是变化、进步为主，还是僵化、停滞为主，其实是一个可以深究和有待争议的问题；用“兰克史学”概念和二元对立模式状述当时已趋于多元化的学术状况，其实有削足适履或者过甚言之的风险。美国历史学在专业化早期确立“客观性”信念的过程曾伴随着对兰克的简化和误读，^①而外交史批判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有意无意地以“兰克史学”概念对美国外交史状况进行的某种简化处理。

整个1980年代美国外交史批判很大程度上都是对梅尔文章的响应，而该文中关于“兰克”的指涉也不断重复出现。首先是《外交史》杂志迅速做出回应，表示梅尔的批判文章“富于思想性、挑战性，而且其中大部分具体的指责都是准确的”，“必须以全然赞赏的态度加以阅读”。《外交史》邀集学科内六位重要人物迈克尔·亨特、入江昭（Akira Iriye）、沃尔特·拉费伯尔（Walter LaFeber）、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罗伯特·舒尔辛格（Robert Schulzinger）、琼·霍夫—威尔逊（Joan Hoff-Wilson）以笔谈形式回应梅尔的文章，除霍夫—威尔逊一人外均对梅尔表示支持。^②其中舒尔辛格高呼：

① 伊格尔斯：《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8—279页。

② “Response to Charles S. Maier’s ‘Ma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5, No. 4, October 1981, pp. 253 - 282. 霍夫—威尔逊的笔谈也只是反对梅尔对新趋势的“低估”，认为外交史并没有“止步不前”，而并不反对外交史急需拓宽、革新的主张。见 Joan Hoff-Wilson, pp. 377 - 382。

哈利路亚，滑落终于止住了！……外交史的大多数成员仍然在以被兰克传人调教出来的先辈那样的方式工作。他们在同一类档案馆中搜罗同一类函件，不停地述录一个官僚对另一个官僚说的话，所以他们的工作缺乏新社会史的光彩……外交史学家仍然在延续一个世纪前的规程，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对他们的古旧过时感到悲哀……^①

在随后的外交史批判文章^②中，“兰克式外交史”也经常是一个通用标签和共同标靶。麦考米克称：“这种历史学的过度泛滥招致多种惩罚，会窒息几乎任何旨在使得该领域趋向复杂精密的努力。”^③如果把外交史批判中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指摘汇总起来，则呈现出一种美国版“兰克式外交史”枯槁贫弱的意象，一种过度和贫困并存的意象，一种除了对美国政府档案的研究和关于美国决策精英的撰述之外什么都欠缺、什么都匮乏的意象：研究和撰述琐屑、零碎，天然地厌倦理论，固守对历史因果关系和历史解释的简单理解，只靠单一的原因或者单一种类的原因解释复杂的历史，缺乏分析和综合，缺乏复杂精密和多样化的方法论和概念工具；过度关注决策者个人的影响并夸大决策者行动的自由度，对外交谈判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作用下降的趋势缺乏认识，对决策背后复杂的制度、政治（官僚政治、党派政治、议会政治等）和社会背景缺乏足够的重视或者认识；过度关注政治军事问题，停留

① Robert D. Schulzinger, p. 272.

② 1982年底，克雷格（Craig）在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演讲中也确认外交史的衰落。他代表的是一种相对温和保守的观点，更重视保持外交史的学科特性。但他也主张克服要历史学家对理论的“天生的不信任”和“对历史事件独特性的坚持”，增进分析的复杂性。Gordon Craig, “The Historia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8, No. 1 (February 1983), pp. 1-11; 除前后文中列出的文献，1980年代的从不同角度参与外交史批判运动的文章还有：William E. Leuchtenburg, “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e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3, No. 3, December 1986, pp. 585-600（该文属少数来自外交史学科以外的）；Charles R. Liley and Michael H. Hunt, “On Social History, State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mmentary on ‘the Cosmopolitan Connectio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1, No. 3, 1987, pp. 243-250; Sally Mark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Washingto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1, No. 3, July 1987, pp. 265-282; Christopher Thorne, “After the Europeans: American Designs for the Re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2, No. 2, April 1988, pp. 201-208; Stephen E. Pelz, “A Taxonomy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9, No. 2, Autumn 1988, pp. 259-276.

③ Thomas J. McCormick, “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Synthesis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0, No. 4, December 1982, p. 319.

于国家的封闭结构之内，缺乏对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面向的认识和思考；过度关注决策过程，过度关注国际关系中的危机事件，忽视国际关系中决策精英群体以外的群体，忽视社会结构和利益集团，忽视非国家行为体，忽视次国家和超国家的层次，缺乏对国际体系的认知；过度关注美国，夸大美国的独特性和影响力，把外交史过多地置于美国史当中，缺乏对美国以外（特别是欧洲和第三世界）的了解和研究，在冷战研究中过于集中于美苏关系，历史比较方法运用不足，多边档案研究不足；过度受制于“当下关切”，过度跟随官方档案的公布，缺乏长期历史眼光和对长期历史趋势的把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外交史的“病理诊断”得出的另一主要结论是它的自闭孤立症状：它缺乏和历史学其他分支以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往互动，拒绝采借吸收学科外的资源，回避外来的刺激和挑战。就此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调用了物种进化的隐喻：一个物种如果没有足够多地与相邻的其他物种发生“碰撞”，则只能进行简单复制的繁殖，没有杂交优势和变异进化的能力。加迪斯戏称，美国外交史正是冯·诺伊曼所说的“自我复制的机器人（self-replicating automation）”，以及生存力虽强、不会立即死亡，但也“原始、无趣”的“鳄鱼、狢狢和蟑螂”之类。^①关于外交史与哪些学科的疏离对它尤为不利，不同学者指涉和强调有所不同：有人指斥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史和美国本国史、外国史各分支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外交史（特别是欧洲外交史）的脱节（乃至历史比较方法运用不足），有人强调外交史不能吸收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的相关成果，有人不满它与跨学科的地区研究缺乏交往沟通的情况。更多学者的意见集中在社会史上，这反映了当时美国历史学主要潮流对外交史的冲击。他们看到，社会史和文化史已经将国家挤到边缘，社会史的方法和理念已经在整体上主宰了美国历史学的趋势，进而认为外交史对社会史的陌生和排斥是导致它参与不到史学变革主流中去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应，批评者普遍主张外交史要与历史学其他分支乃至社会科学相关领域达成“综合”，认为这是挽救外交史的基本途径。当时兴起中的“合

^①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No. 3, July 1990, pp. 405–406.

作主义”实际上就代表了一种社会史路向的综合主张。^①另一种同样凸显综合旨趣而且影响更广泛深刻的思潮也在外交史批判中正式登场，这就是倡导历史学“国际化”和把外交史改造为“国际史”的主张。国际史理念强调人类历史相互联系的特性，提倡扩大历史研究的空间范围，“去民族国家”即超越民族国家的分析层次，尤其重视观念、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是一种范围更开阔、对综合有更高要求的路径。^②

大体而言，1980年代外交史批判中的讨论并不专深、复杂，很少围绕专门研究展开，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争议往往被一带而过；与后一时期相比，援引借取学科以外思想资源的情况也不很多。^③焦虑、激切、决绝是这个学科的基本心态，明快、直接、尖锐使批判具有“运动”的风貌，批判、呼吁和号召使整个学科处于翻腾激荡之中。对于理解外交史批判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的特性及其“自我鞭挞”的情状，感知学科文化转变的大势，对其中的语汇修辞予以留意很有助益。许多新造的和借用的用以摹画外交史的总体不良现状的隐喻和标签反复出现、广为转用，以至于成为批判中的标号语。这些语汇本身即具轻贬含义或在语境中被赋予贬义，其中有不少纯属讥讽讽刺，它们对冲击常规外交史的权威和声望，营造批判和变革的思想与话语氛围具有特别的效应。流传最广的是前文提及梅尔所谓外交史是“后娘养的”的说法，以及加迪斯制造的“自我复制的机器人”和“充满鳄鱼、豺狼和蟑螂的进化

① “合作主义”早期宣言之一是：McCormick, “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Synthesis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pp. 318 - 330。

② 倡导国际史最力的当然是入江昭，尤见 I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1, February 1989, pp. 1 - 10。另见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26—46页。

③ 不过，思想史家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和社会史家斯蒂恩斯（Stearns）呼吁历史学克服分离加强综合的文章显然受到特别的重视和呼应。见 Thomas Bender, “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3, No. 1, June 1986, pp. 120 - 136; Peter N. Stearns, “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y: A Progress Report”,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19, No. 2, December 1985, pp. 319 - 334。

空间”。^①此外还有：“一个官僚和另一个官僚的对话”、“总部史学 (headquarters history)”、“记述‘死去的白人男性精英 (dead white male elites)’的历史学”、“‘美国和某某’范式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radigm)”、“逆历史学科主流的游泳 (swimming against the strongest currents of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history)”、“必须被放倒的尸体 (a corpse that has to be made to lie down)”、“干肉 (dry meat)”、“地道式历史 (tunnel history)”、“村社手工业 (cottage industry)”、“无性繁殖的种群 (clones who dutifully turn out other clones)”、“孤域 (enclave)”、“行会 (guild)”等。用于状述学科特性和状况的语汇还有：孤立主义 (isolationism)、传统主义 (traditionalism)、偏执狭隘 (provincialism)、学科门户主义 (disciplinary parochialism)、狭隘性 (narrowness)、简单化 (reductionism)、过度简单化 (over-simplistic)、缺乏想象力 (unimaginative)、“档案的专制” (tyranny of the archives)、幼稚的实证主义 (naïve positivism)、零碎化 (fragmentation)、画地为牢 (compartmentalization)、分裂 (schism)、进化停滞 (evolutionary stagnation)、沙文主义偏向 (chauvinistic biases)、种族中心论 (ethnocentric)、美国中心论 (American-Centric)、美国主义 (Americanism)、国家中心论 (state-centric)、单面的 (one-sided)、单向度的 (one-dimensional)、精英主义 (elitism)、方法论贫瘠 (methodological poverty) 或缺乏方法论复杂性 (lack of methodological sophistication)、流水账式的解释 (laundry-list explanations)、揭秘 (exposes)、食谱 (cookbooks)^②、从宫廷到危机到谜辛 (Camelot to crisis to conundrum)、枯萎 (languishing)、空洞枯燥 (jejune)、沉闷贫瘠 (sterile)、返祖复古 (atavistic)、倒退 (retrogressive)、干瘪枯槁 (hidebound)、不关题旨 (irrelevant)、过时 (out of fashion 或 old fashioned)、边缘化 (peripheralization, 指在历史学科中地位而言), 等等。关于外交史的

^① 后文列出的语汇多散见于本文前后引文来源中, 此处不一一注明。一个集中使用此类语汇的例子: Geir Lundestad, “Moralism, Presentism, Exceptionalism, Provincialism, and other Extravagances in American Writings on the Early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3, No. 4, October 1989, pp. 527 – 545. 关于话语、词汇与学科知识性质和学科文化的关系, 见 Tony Becher and Paul R.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s*, 2nd Edition,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6 – 47.

^② 舒尔辛格用该语指那些有意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指导的作品。见 Robert Schulzinger, “Response to Charles S. Maier’s ‘Ma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5, No. 4, October 1981, p. 373.

迫切需要、转变方向和未来愿景，则多以下列词汇加以归纳：“重新定义（redefinition）”、“结构重建（reconfiguration）”、“概念重塑（reconceptualization）”、“新生（revitalization）”、“复兴（rehabilit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去民族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拓展（broadening）”、“多样性（variety）”、“灵活性（flexibility）”、“流动性（fluidity）”、“复杂性（complexity）”、“杂交（cross-fertilization）”，等。

标示 1980 年代外交史批判运动的精神气质和学科认同变化的，还有学科名称方面的议论和变化。当时不时有人提出关于废止作为学科名称的“外交史”一词（以及给对外关系史学会和《外交史》杂志更名）的议论。^①在该领域对“外交史”的认同趋于弱化情况下，“对外政策史”、“对外关系史”、“国际政治史”、“国际关系史”、“国际史”等名称和“外交史”越来越多地交替使用，而用“外交史”以及被认为同样含义狭窄的“对外政策史”的人越来越少，认同和使用包容广泛的“国际关系史”（以及“美国国际关系史”）特别是“国际史”（以及“美国国际史”）的学者则越来越多。“外交史”作为专业名称并没有消亡，但经过外交史批判运动，正如罗格沃尔（Frederick Logevall）观察到的，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美国外交史”名下的教职已经绝迹，“美国对外关系”也很少见了。^②

四、外交史批判运动阶段二：多元化与新学科文化

梅尔文章发表整 10 年后的 1990 年，《外交史》杂志又一次组织关于学科状况和趋势的笔谈。^③参加笔谈的伊莫尔曼（Richard M. Immerman）说：

过去大约 10 年间，就我们的学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应该怎

^① 如见 Christopher Thorne, “After the Europe: American Designs for the Re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2 No. 2, April 1988, pp. 206 – 207; Thomas G. Paterson, “Defining and Do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Prime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No. 4, October 1990, pp. 584 – 586.

^② DeConde, *Ibid*, p. 284; Frederick Logevall,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March 2009, Vol. 94, No. 5, pp. 1074 – 1078; 另见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vii.

^③ “Writing the History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A Symposium”,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No. 4, October 1990, pp. 553 – 605.

样加以治疗，我们已经花了无数的时间去阅读、写作和讨论。这种讨论是健康的，而且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高质量的作品，特别是年轻学者的作品。然而，我想是时候要停止或者减少现在已经过分的反省和自我鞭挞。我怀疑我们还能给已经足够丰富的药方和诊断增加些什么新东西。^①

笔谈的几篇文章都表达了对外交史批判的保留、矫正意见或者说某种程度的反批评。罗伯特·麦克马洪 (Robert McMahon) 认为，地区研究和国外资料对国际关系史有重大价值，但其作用也不必过度放大。拓宽国际视野、广泛利用外国资料是必要的，但外交史既有作为国际史的部分，又有作为美国国内史的部分，而鉴于美国在 20 世纪的重大影响，把美国外交史中相当大的部分继续作为美国史的分支，就是合理和必要的。再者，美国外交史学者早已在大量使用外国资料，所以关于外交史“美国中心主义”的指责有些过甚其言。他还认为，外交史批判中出现的某些猛烈药方实际上将加深而不是减弱学科的边缘化状况。^②托马斯·佩特森 (Thomas Paterson) 则认为对外关系史的分析包括国际、地区、国家和个人四个层次，相应的对外关系史应该包容国际史、地区史、国家史和历史传记研究各个组成部分，各有其理由和价值，不应偏废，在当前情况下要特别警惕防止“历史学普遍的去个人化”趋势。^③

这次笔谈透露出来的讯号是，矫枉纠偏的机制开始运作了。这个学科在肯定和接纳过去十年批判运动的主要成果和共识的同时，开始试图缓和批判的激进性，矫正其中的过度之处，并以一种更具前瞻性的态度来面对学科的问题。同时，对学科历史和现状的考察评估中开始更多地考虑到积极的、变化的方面，也对维护学科特性问题予以更多留意和讨论。这次笔谈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外交史批判运动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学科由焦虑到更多的自信和自我期待、由“自我鞭挞”的批判向更具建设性的舆论方向转变。这个过程中“兰克外交史”的意象消退淡出了。其实早在这次笔谈两年前，长期关注学科状况并很早就参与外交史批判的亚历山大·德康德已经试图纠正他所认

① Richard M. Immerman, "The History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A Plea for Pluralism",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No. 4, October 1990, pp. 582 - 583.

② Robert J. McMah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ational History 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No. 4, October 1990, pp. 554 - 564.

③ Paterson, "Defining and Doing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Primer", pp. 584 - 601.

为外交史批判的过犹不及之处了。德康德著文辩称，过去 20 年间该领域实际研究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和进步才是主流，包括他本人在内以往对外交史的过度攻击是因为不了解该学科的变化和进步，或者夸大了外交史的弊端和困难。^①

这次笔谈还预示了 1990 年代外交史研究、反思的基调，也是试图建立的新学科文化的中心题旨，即“多元化”。麦克马洪的笔谈以多元化主张收笔：“相互竞争的多种分析模式应该与周期性开展的自我批评和检审一样受到欢迎。这是健康的表现，而不是停滞的迹象。”^②笔谈作者之一艾米丽·罗森伯格（Emily Rosenberg）则就国际史强调指出：“国际史不是一套单一的方法论，而是……一片边界和地貌尚未确定的巨大空旷的原野。”^③伊莫尔曼的笔谈文章以“对多元化的呼唤”为题，并这样结尾：

让我们继续做我们的工作：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我不应该指责你不写我要写的书。我写我的书，你写你的书，但是我们应该互相读对方的书。何必非选择同一种类型不可呢？何必非搞观念帝国主义（conceptual imperialism）不可呢？我们的兴趣和研究议程各不相同。我们不必都用一种方式界定这个研究领域，也不必都去用一种方法论和框架。这不是主张保持学科现状。我们都主张变革，这个学科也正是因此而富有活力。历史写作是一个积累的进程，而不是一场赢者通吃的斗争。正如对国家间关系一样，零和竞争对学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合适了。^④

1990 年代外交史批判仍在继续，对外交史学术史和现状的清理和评估也没有终止。但乐观的展望取代了焦虑的学科情绪，实际研究的变化趋势也在支撑着多元化的主张。1990 年代前期几篇重要的学科状况述评文章都认为多元化既是学科现状又是未来有待进一步深化的方向。迈克尔·亨特在 1991 年指出国际史的“入侵”已经导致外交史的边界被模糊化和学科宽度大增；他在 1992 年更宣告“外交史的长期危机行将终结”，指出学科中“更高程度

① Alexander DeConde, "Essay and Reflection: On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0, No. 2, May 1988, pp. 282-301.

② Robert J. McMahon, *ibid.*, p. 564.

③ Emily S. Rosenberg, "Walking the Border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No. 4, October 1990, p. 566.

④ Immerman, "The History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A Plea for Pluralism", p. 583.

的解释宽度和方法论多元化”支持着这一判断。他还认为应该按照实际研究中呈现出来的多种具体问题的研究路径界定学科，这种做法要优于“从主导性的方法论、核心题旨或者分析层次出发去组织对学科的理解”的做法。^①这与伊莫尔曼一样，他实际上表明了一种认识学科内涵和学科特性的宽松方式。拉费伯尔在1995年则指出：“这个领域已经演化成一个运用全部历史学路径——包括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并在必要的国际的和跨文化的框架中研究关于‘战争和和平的关键问题’的学科了。”^②

与前一阶段的外交史批判相比，1990年代后的学科讨论中借取、吸收其他学科理论和思想资源的类型更多、规模更大了，“文化转向”和“国际史转向”取代社会史议题成为最突出的呼吁和方向，这都使多元化和学科增容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新一代学科领袖梅尔文·莱弗勒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主席演讲^③中指出，这个学科内已经涌现出的丰富多样的议题和类型终结了它的边缘化状态，“我们探究权力、政治和国家；我们探究国家政治体系内的社会集团现象，探究少数族裔的信仰和情感；我们探究神话、符号、意象和集体认同的形成。我们研究多国公司、工会和慈善组织的跨国影响。我们处理我们的消费文化、个人自由理念和私营市场经济理念在海外的传播……”。“我们认真对待权力和国家，研究社会、政治经济体系和国家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探究观念、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认同，我们关注修辞、政治和政治动员，我们关切比较的和跨国的历史……”。他在谈及外交史中运用理论和寻求综合的问题时指出，没有任何单一的理论能够克服外交史的零碎化问题，或者提供借以达成综合的框架类型，但是：

对我而言，不同的理论都勾勒出需要探究的各种假设的相关性；它们照亮了我原本可能想不到的一些潜在的因果联系。它们对我正在考察的问题提供了思考的参照系。在冷战研究中我不采纳任何单一的理论。但是现实主义使我敏锐觉察国际体系的运作，世界体系理论帮助我理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作用；官僚政治理论提醒

① Michael H. Hunt, "Internationalizing U. S. Diplomatic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5, No. 1, January 1991, pp. 1 - 11; Michael H.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6, No. 1, January 1992, pp. 115 - 140.

② Walter LaFeber, "The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4 (Oct., 1995), pp. 1032 - 1033.

③ Melvyn P. Leffler, "New Approaches, Old Interpretations, and Prospective Reconfigur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9, No. 2, Spring 1995, pp. 173 - 196.

我密切注意各个政府部门的行为，认知理论加深我对威胁认知和决策的理解。这是一种折中主义的兼容并包（eclectic brew），而不是打造完美的外交史的一整套处方。但是如果说现实如此复杂以至于难以成为任何单一理论所把握，那么，不同的理论却可以帮助历史学家理解他们所考察的现象、事件或者进程的不同部分。^①

莱弗勒在这里表达了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而这番话还显示，多元化的精神与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并行共生。迈克尔·霍根的表述也与这种精神相互呼应：“正如责怪吸收不同范式提供的洞见的努力是错误的，责怪某种理论范式不能解释所有的东西也是错误的。”^②

“多元化”已是当时实际研究中的既存事实，也是新学科文化最突出的标记。实际上它本来就是外交史批判的自然产物。在1980年代的外交史批判中，多元化已被不断提及，可以说是运动中的明确诉求之一。当时出现的各种强调综合的主张中就内在地蕴含着多元化的诉求。“合作主义”和“国际史”旗号下的综合类型都主张拓宽研究视界、兼顾更多面向，寻求在更大范围内、更多因素之间达成综合，因此都在实际上与多元化主张相交叠。但到1990年代，多元化和综合之间的紧张关系受到更多注意。以综合为主旨的研究议程往往牵连对某些特定因素和方面的强调，也经常附着较具刚性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案，只能包容有限度的多样化，自然也就不时引起新的保留、警告和批评意见。在特定的综合路径的内部和外部，都有题旨、样式繁多的研究在出现和发展，学科的多样化实际上在不断出离或者拓宽原有的综合主张。^③莱弗勒指出：“综合的追求不会导致共识，恰恰相反。在众多变量中究竟应该如何做出权重，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将会打开新的解释前景。”莱弗勒和其他学者都认为，在对新综合的追求中，关键不在于问题是新的还是老的，而在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新的综合的可能性是以研究的充分复杂化以及各种主张、研究策略和方法的并存为条件，任何过于排他、激进的整

① Leffler, *ibid*, p. 179.

② Michael Hoga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Hogan (eds.), *American in the Worl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65.

③ “合作主义”领袖霍根指出了这个学派变得复杂变通的趋势，见 Michael Hogan, “Corporatism”,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 148.

体主义 (holistic) 观点下的综合努力都有致命的缺陷。^①伊丽莎白·霍夫曼 (Elizabeth Cobbs Hoffman) 也认为,“新外交史”并不要求统一的解释框架,它包容现实主义、合作主义、文化研究和许多其他视角,同时既会欣赏以往更传统的历史学家,也不排除威廉斯之类的学者的深刻见解。^②在更高的多元化呼声之中,综合主张的音量被压低了。

多元化和学科增容成为 1990 年代以后外交史学科最突出也最具涵盖性的议题,这延续到 21 世纪。《解释美国对外关系》(第二版)是 21 世纪初对外关系史学科多元化格局下多种问题路径和研究议程的一个集体亮相。该书编者指出:“美国对外关系史正在开发新的研究课题,开采海外的档案,采用新的方法。一些人正试图重组学科,另一些人则在探索对旧研究路径加以思考的新方式。”这部论文集力图展示,这个学科如今包纳和兼容了哪些在以往的“外交史”中无容身之地的理论、理论和研究路径:国际关系理论,官僚政治,心理学,国家安全问题,合作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地理、学科和时间上的跨越边界问题,比较历史视野下的边疆—腹地关系问题,现代化理论,意识形态,文化和国际史,文化传播、理论、语言和隐喻,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历史中记忆问题。我们知道,这些研究主题都是在别处诞生成长起来的,现在它们在新学科文化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史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居。新研究被接受,在学科中获得稳定地位,这个学科的能力和格局已然根

① Leffler, *ibid.*, p. 180; McMahon, *ibid.*, p. 564. 前文提到的文献中,也有涉及对合作主义和国际史的保留、警告和批评的。

② Elizabeth Cobbs Hoffm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Meaning of Life: Toward a Global American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1, No. 4, Fall 1997, pp. 501 - 502.

本改观。^①该书出版当年，霍根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主席演讲中敦促同行们要更积极地响应历史学整体的“文化转向”和“国际转向”，包括更积极地吸收后现代学术的营养，“尽最大可能开放和包容”。他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和国际化”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避免学科边缘化的途径；即便这种做法会弱化学科特性和学科认同，这种代价也是值得付出的。霍根认为，“美国外交史学者实际上正在将他们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控制权转交到其他学科的专家手中”，但美国必须联合“那些并不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专业中，但对美国历史学的国际化作出贡献的学者”。^②

维护学科特性的呼声不是没有，但既少且弱。托马斯·泽勒（Thomas Zeiler）在考察评议学科内各种分支和取向后认为，多元化导致过度的纷乱和不确定性，“杂交”（cross-fertilization）已经使得外交史“面目全非”，学科边界模糊不清。他尤其强调国家地位中心的丧失导致学科特性的过度弱化，主张现有多元化趋势应该有所收束、回潮，重新确立国家在学科内的中

①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引文见 p. vii. 关于对该书“智识多元主义”精神的评论，见 Thomas Alan Schwartz, “Explaining the Cultural Turn—or Detou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1, No. 1, January 2007, pp. 143–145. 关于同一时期对学科多元化和跨学科状况的评议，另参见 Brenda Gayle Plummer, “The Changing Face of Diplomatic History: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Historical Teacher*, Vol. 38, No. 3, May 2005, pp. 385–400.

两部工具书也突出反映了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学科多元化和学科增容的状况。在《历史学家和历史写作百科全书》中，“外交史”词条写的不是外交史的知识成就、稳定特性和静态格局，而是讲述它通过质疑最初的兰克模式和自我改造而向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拓展和转换，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的历程。在2002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政策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编者之一即曾认为外交史批判过于偏激的德康德表示，该书编辑工作的基本考虑就是承认和接受对外关系史中的分歧和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历史解释的灵活性、复杂性和微妙精深……这种多元化状况丰富了我们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理解。”较之该书1978年的第一版，121篇中有44个是新增的，其中包括：“非洲裔美国人”、“文化帝国主义”、“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性别”、“全球化”、“移民”、“毒品政策”、“有组织劳工”、“宗教”和“科学技术”，等等。见 Saho Mastsumoto, “Diplomatic Histor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lly Boyd (ed.),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Writing*, London,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1999, pp. 314–316; Alexander DeConde, Richard Dean Burns and Frederick Logevall (ed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2nd edi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2, 引文见 Deconde, “Preface”, p. xv.

② Michale J. Hogan, “The ‘Next Big Thing’: The F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8, No. 1, January 2004, pp. 1–23.

心地位。^①但泽勒显然属于少数派。对他提出驳议的两位学者都认为，不应以国家和权力议题界定对外关系史的实质和内容，而且不应自命中心而把别的方法视角推到边缘。霍根森（Kristin Hoganson）称：“在兴起的大批研究路径中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只有无数联结互动的交汇点。”^②

学科和学科间体系是现代专业化学术知识的基本组织方式和制度形态，而学科和其他社会制度和社会群落一样，也有其文化的内核和面向，或者说有其可识别的制度文化或者“亚文化”。特定学科的“学科文化”与学科内专业知识的性状、构成和知识生产方式与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根据知识社会学对学科的相关研究，对学科文化的识别和考察大体上可根据某一学科在如下两个基本方面做出：第一，学科作为“认识论共同体”的基本取向，即学科在与认识论相关的各种问题上的明确的或默会的态度，特别是对客观性的可能和限度问题的态度；第二，界定学科的方式和学科认同的构成，以及对学科的“自主性”、学科边界、本学科与其他学科和知识部类的关系等方面的态度。^③

知识依赖于学科而生，而知识和思想的演进又总是在超越和改造学科的制度和文化。我们已经看到，持续的外交史批判和反思在上述两个向度上改造了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学科文化”：第一，认识论自觉的提升，对历史解释的性质和方式的反思，对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新认识，学科内部的“文化转向”，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排挤、销蚀了早期那种

① Thomas W. Zeiler, “The Diplomatic History Bandwagon: A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5, No. 4, March 2009, pp. 1053 – 1073. 另见 Thomas W. Zeiler, “Diplomatic History Isn’t Decline”, History News Network, <http://hnn.us/articles/107927.html>.

②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What Bandwagon? Diplomatic History Today”; Kristin Hoganson, “Hop off the Bandwagon! It’s a Mass Movement, Not a Parad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5, No. 4, March 2009, 1083 – 1086, pp. 1087 – 1091.

③ 此处关于学科特性和学科文化的讨论受下列研究的启发和引导：Tony Becher and Paul R.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s*, 2nd Edition,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6 – 47; Thomas Bender and Carl E. Schorske,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尤见 pp. 3 – 13; Anthony Bigla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 Matter in Different Academic Area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57, No. 3, 1973, pp. 195 – 203; Julie Thompson Klein, *Crossing Boundaries: Knowledge, Disciplinarit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Charlottesville, VA: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6; Everett Carl Ladd, Jr.,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Divided Academy: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与外交史“技艺”特征相联的“幼稚的实证主义”，对客观性和确定性的绝对主义主张消失，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复杂化，更具相对主义、折中主义、多元主义特性的认识论主张占了上风；^①第二，界定学科的方式由狭窄变得宽泛，由以单一、传统沿袭的工作方法和研究程式转向以多样化的研究主题界定学科，学科认同由紧密变得疏松，学科主导“范式”（兰克式史学）的权威性下降，学科的“强固自我意识”（strong ego）和强固内部知识共识消退，方法论“多元主义”成为学科共识生成的新基础；相应的是国际关系史学科边界的开放、模糊化，以及大片“自由边界地带”的出现。进而言之，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学科演变的基本趋势是：由“趋同性”（convergence）学科变为“趋异性”（divergence）学科，由“硬学科”变为“软学科”，由“范式型”（paradigmatic）学科向“非范式型”（non-paradigmatic）学科转变，由汇聚的、紧密结合的学科变为发散性的、松散结合的学科，由“学术部落”（academic tribe）转变为自由联合、自由进出的学术群落。

此外，关于学科和学科文化的讨论有时还涉及学科内部对学科与公共生活、政治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态度。对此前文较少涉及，但有两点可以提出：第一，1980年代对外交史“衰落”的判定中，外交史在大学体系和公共生活中地位和影响力下降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而重建对外关系史在公共知识生活中的影响力是1980年代以来学科批判和反思中的激切吁求之一；第二，冷战前期外交史与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政策密切、亲和的关系，以及服务于冷战的政治和“道德”责任，在“修正主义”兴起和外交史批判推进的过程中趋向瓦解。经过外交史批判而建立的广泛共识和趋向是，疏远国家权力和官方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建立起更密切的关联，把学科的公共责任定位于提供对外部世界和美国自身的了解和理解。这一点在“国际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文化研究中尤为突出。

外交史学科特性和学科文化转型的根源和动力涉及学科内部性状、外部智识环境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各方面分别的和交互的作用，极为复

① 关于国际关系史学者在学科认识论方面进行深入思考，主张对“客观性”采取灵活、有弹性的观点的透彻申述，见 Marc Trachtenberg, *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 - 29。关于“文化转向”在认识论上对外交史的“挑战”和影响，见 Emily Rosenberg, “Considering Borders”,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p. 185 - 189。关于文化研究造成对因果思维造成的冲击，见 Leffler, “New Approaches, Old Interpretations, and Prospective Reconfigurations”, pp. 180 - 181; Emily S. Rosenberg, “Foreign Affairs after World War II: Connecting Sexu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8, No. 4, pp. 59 - 70。

杂，在此难以全面处理。但外交史直接的外部智识环境中发生的，与这一转型的内容和方向高度一致的两个主要趋势值得提及。首先是诺维克（Peter Novick）所说的发生于1960年代的“认识论革命”，即从多个学科和思想领域（诺维克尤其强调来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冲击）发起的对美国战后社会科学那种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以理想化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内核的学术思想模式的挑战，这场“革命”冲击和销蚀了客观性、价值中立和专业自主性的信念，使伦理的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声势上扬，对历史学的影响尤其深刻。^①其次，在历史学内部，接续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比尔德（Charles Beard）“新史学”精神，战后出现了持续、强劲的强化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而非“人文学科”）的身份、促进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部门交往沟通的呼吁和实践，^②从而使得“跨学科”成为战后美国历史学的一种长期趋势和许多历史学者的新工作伦理，而历史学成为“跨学科沟通最为繁忙的地方之一”，历史学者经常成为“盗取邻居牲畜庄稼的‘有执照的窃贼’”。^③历史学整体的学科特性和文化环境已然大变，而新学科文化在外交史中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历史学内的整体潮流向这个曾经相对封闭、板结的次级学科领域延后二三十年的扩散。也许正是因为它延迟了，所以其学科文化的转型才通过一场批判运动来实现，而批判也才呈现出更激切、决绝的风貌。无论如何，历史学内提升认识论自觉、对学科和学科间关系建立更深入的思考，势必引发对“学科崇拜”的反思和割弃，引导历史学者建立

①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pp. 546 - 563.

② 也许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发布的两份工作报告：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istorical Study: 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storiography*, Bulletin 54, New York, 1946; SSRC, *The Social Sciences in Historical Study: 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storiography*, Bulletin 64, 1954。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布林顿敦促其同行都要“阅读和深思”1954年SSRC报告。见Brinton, “Many Mans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9, No. 2, January 1964, p. 312。

③ Klein, pp. 71 - 78; Becher and Trowler, *Ibid*, p. 45.

自我“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的自觉性。^①没有这种精神要素和“(学科)文化自觉”,一个学科如此剧烈的自我批判和如此彻底的多元化风貌是难以想象的。美国外交史的转型也昭示,对专业化的既有模式乃至专业化本身建立一种矫正、抗衡和超越的“自反性 (reflexivity)”文化机制,是现代学术“专业化”本身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关系史领域新学科文化的形成,正意味着对“专业化”和“学科”的超越甚至某种程度的背反。

五、超越外交史的冷战史与扩张的冷战观

冷战史是外交史/国际关系史领域中最大、最重要也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冷战的突然终结引发了1990年代以来冷战史不期而至的新繁荣,而这一繁荣最初的动力是来自档案资料方面。苏联东欧的政治变局使以前密闭的档案资源被大量(虽然也是有限地)披露出来,出现了新的档案淘金热,一些冷战史学家急于对“山的那一边”予以历史揭秘和细部刻画,进而描绘拼合出准确的冷战史全面图景。1970年代兴起的由约翰·加迪斯领军的冷战史“后修正派”显然是这一档案研究热潮的主力 and 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先号召和自命为“新冷战史”的学者。1996年初,加迪斯提出和界定了新档案条件下的“新冷战史”;^②次年,他总结了新档案研究的初步成果,对前期冷战

① 著名中国史专家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曾就此提出过简短而有力的申述:“根本的一点……是:无论一个人所属的学科是什么,他的总体文化素养——也就是他的‘通识教育’——越广泛、深入,他也就越愿意将各种来源的智慧纳入到他所研究的问题中。而无论这种智慧是否来自他自己所属学科的‘方法论’,这都会增加他讲出一些重要的东西的可能性。相反,如果从狭隘的自足的‘模式’或者‘系统’的意义上界定‘学科’,机械地把这种孤立的‘学科’运用于对一种文化的研究,……则必然导致贫乏甚至荒谬的结果。” Benjamin Schwartz, “The Fetish of the ‘Disciplin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4, August 1964, p. 537.

② Peter Kindsvatter, “Report on the Temple University—Exploring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SHAFR Newsletter*, Vol. 26, No. 4, December 12, 1996, pp. 12–19, 转见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38—42页。

史中的一些传统问题提出新的思考和解释，自信满满地宣称“现在我们知道了”。^①这种初期阶段的“新冷战史”显现出的特征是，利用新出现的档案资料对苏联和前社会主义阵营历史事迹的重点发掘，对冷战起源和其他早期冷战史中的决策过程的重新关注，以及对美苏行为的新的“帝国”解释模式。这时的“新冷战史”也体现了一些外交史批判以来的研究主张，包括强调多国档案研究方法，对美国、苏联以外的次级大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更多重视，对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的重新估价。^②携带着新档案资料的力量，1990年代中后期的冷战史一度似乎出现了为加迪斯式“后修正派”所主导和规定的迹象。

但更多的人看来并不愿意让加迪斯一派来代表真正的“新冷战史”，更不会认为它能使对冷战的解释和理解从此定于一尊。加迪斯仍遵循现实主义思想路径，大体延续了传统外交史的政策（战略）研究模式，在对冷战起源的解释和“罪责”追问上向早先的“正统派”明显复归，这些都遭受广泛批评，而批评意见有许多回响着外交史批判和反思中的观念和主张。在这些批评中，加迪斯在某种程度上与“旧”外交史和冷战史联系在一起。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指出：“新冷战史并不像他的代表人物一般宣称的那么新，尽管他们号召要把旧的、陈腐的学派抛在身后。一些显著的——而且也是相当不幸的——连续性仍旧存在于新、旧冷战史之间。”他还断言所谓“新冷战史”对冷战全面解释的努力并不成功，其“音调多少是传统主义的”。^③此外，批评者们也都不主张过多地以新档案来界定“新冷战史”，纷纷告诫对档案研究的功效不能寄予过高期望，“正统加档案（orthodoxy plus archives）”的研究模式并不是冷战史的合理方向。尼德·勒布（Richard Ned

① John Lewis Gaddis, *We Know Now: Rethink Co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反映这一时期档案研究的“新冷战史”代表还有：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tis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the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关于这一阶段的“新冷战史”，另见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缘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3—22页；加迪斯1998年对新冷战史的简要阐述，见John Lewis Gaddis, “The New Cold History”, http://www.unc.edu/depts/diplomat/AD_Issues/amdipl_9/gaddis_coldwar.html (2011年5月2日)。

③ Geir Lundestad, “How (Not) to Stud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Odd Arne Westad, *Review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p. 67—68.

Lebow) 指出,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量出现的档案和当事人回忆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关于一战起源的争议, “来自档案、访谈和会议的新证据永远不会提供关于冷战怎么开始、又如何终结的问题的确定‘答案’”。他指出, 除了新的档案, “‘新’冷战史还需要新的问题”。^①莱弗勒在一篇广受关注的对加迪斯的回应文章中指出, 当前档案研究可能会产生新的误导作用, “新的档案文件如果不能与对美国方面已知的情况细密地结合起来, 则会将历史学家引入歧途, 阻止他们对冷战做出全面和精致的分析”。莱弗勒肯定新档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也丰富了对冷战的解释, 但他认为新档案研究最突出的后果并不是它产生了更清晰的、更确定的对冷战的看法, 而是它“对多种多样的结论打开了大门”。^②其实, 新发掘的档案资料总体上并没有显著改变利用它的人的研究路径和结果, 从事这种研究的马斯特尼 (Jojtech Mastny) 自己也说: “从俄国档案中发现的最大出人意料之处就是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处。”^③

当然有理由认为, 后冷战时代自然会产生“新冷战史”, 但以后冷战时代的档案条件为主界定“新冷战史”的方式显然忽视了当时已经形成的学科状况和学科文化的大势。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 就围绕加迪斯式“新冷战史”的最初争议总结说: “显然现在还太早把新冷战史看做一个单一的路径, 更不用说什么‘学派了’……在史学史意义上, 它是1980年代以来的趋势的高潮, 其方向是把冷战史做成国际史, 而不是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一个分支。就其本质而言, 新冷战史在研究上是多国档案的, 在分析上是多极的; 而且在一些最成功的范例中, 它还具有理解不同的、有时还是相互冲突

① Richard Ned Lebow, “Feature Review: We Still Don’t Know!”,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2, No. 4, Fall 1998, pp. 631–632.

② Melvyn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4, No. 2, April 1999, pp. 501–524. 其实, 加迪斯本人也告诫档案研究可能产生误导效果: “新的文件的获得已经导致一种退步, 即我们可能比十年前更不愿意从事大规模分析了。” John Lewis Gaddis, “On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A Naï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old War”, Westad (ed.), *Review the Cold War*, p. 29. 加迪斯的弟子杰里米·苏里 (Jeremi Suri) 也指出, 档案中提供的对事件和细节的了解并不能解决冷战史的某些重要问题。Jeremi Suri, “Explain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ical Consensu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4, No. 4, Fall 2002, p. 91.

③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the Soviet Insecurity*, p. 9.

的思维模式的能力，因此还是多元文化主义的。”^①实际上，不仅冷战史研究在当时没有产生单一学派，在此后十多年间这种可能性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弱乃至消失了。不仅单一学派的冷战史景象不存在，似乎众多新起的研究路径中也不见以学派自称自命者。想来，多元主义的学科文化中的冷战史学者也许会赞成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多年前就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这个判断：“学派经常是掩盖无知的标签，因为某一学派中的成员会认为加入这个学派就可以代替必要的才智。”^②

实际上，至1990年代末，作为外交史批评运动的结果，作为“国际史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结果，作为大量其他领域的研究议题和兴趣向冷战史渗透和融合的结果，在扩张了的冷战史学术空间中，在“后修正派”的旁侧，已经有大量新的研究类型和议题繁茂生长，出现了不可胜数的分别大致可被归类为“冷战的经济史”、“冷战的社会史”、“冷战的文化史”、“冷战的思想史”乃至冷战的“科学史”、“知识史”的作品。^③很多研究超越了传统外交史，更越过对“新冷战史”最初较为狭窄的定义。把“新冷战史”界定为后冷战时代的冷战史研究虽然宽泛，但似已舍此无他。在新的以多元化、复杂化和学科增容为特征的学科文化和学科认同方式之下，不仅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传统关切与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科学等因素空前密集、广泛地相结合，而且一些学术背景本非国际关系史的学者通过把自己

① Odd Arne Westad, "Introduction: Reviewing the Cold War", Westad (ed.), *Review the Cold War*, p. 5. 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尖锐批评加迪斯的“简单化”：“对加迪斯而言，简单化的正当方式不是经过简化的真理，而是真理本身。矛盾冲突、精细微妙和不确定性从他的作品总消失了。”Anders Stephanson, "Simplexism", *New Left Review*, Vol. 49, January-February 2008.

② Joseph Schumpeter, "Recent Develop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edited by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88 - 290.

③ 部分反映新冷战史类型和议题的论集见：Saki R. Dockrill and Geraint Hughes (eds.), *Palgrave Advances in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8 - 10; Silvo Pons and Federico Romero (eds.), *Reinterpre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ssues, Interpretation, Periodizations*, New York: Frank Cass, 2005; 更简要的综述：Michael F. Hopkins,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Continuing Debate and New Approaches in Cold War Histo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0, No. 4, 2007, pp. 913 - 934. 以笔者所见，冷战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比“冷战经济史”研究距离传统外交史更远，数量也较后者更多。关于冷战文化史和社会史的一个陈列，见 Rana Mittre and Patrick Major (eds.), *Across the Blocs: Cold War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London: Frank Cass, 2004; Robert Griffith, "The Cultural Turn in Cold War Studies",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29, No. 1, April 2001, pp. 150 - 157.

的议题与冷战时代、冷战现象予以结合，而涉足冷战史领域并被接纳。莱弗勒对冷战史的现状评论道：

国际史学者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因素编织到他们各自不同的叙事中了——我们认真对待观念、价值、语言和文化，我们思考种族和性别，我们探究“强大”国家和“弱小”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把经济与地缘政治因素结合起来，我们评估意识形态对权力、威胁和机会的认知的影响，我们考量国内政治文化在塑造战略、外交、战争和和平中的作用，我们探究军事能力和外交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这些，已经使得冷战的故事在变得越来越有趣和复杂的同时，很可能也越来越富于争议性了。冷战拒绝任何单一的主导框架叙事（master narrative）。^①

莱弗勒的这段话可以被认为反映了界定“新冷战史”的主流方式。而与这种方式相连带，是以超越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方式定义冷战，认识到在政治军事对抗、外交博弈和大国关系之外还有冷战，认识到冷战和20世纪诸多历史事态乃至当代世界的关联，认识到冷战不仅是国际关系史事件的总合，而且是20世纪的一项世界历史运动。在时间^②和空间上、在议题和面向上，“冷战”的概念都被极大地扩充了，“全球冷战（Global Cold War）”和“总体冷战（Total Cold War）”成为扩充了的冷战观的新标签。莱弗勒断言，多元化的冷战史研究现状要求研究者必须把“冷战作为一个复杂体系”（the Cold War as a complex system），而“简约的理论和头脑简单的解释无法恰当处理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性”。^③

对冷战的新的认知方式之下，一方面对冷战史达成整体共识和全面综合的前景被无限期推迟（实际上是彻底消失）了；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又在往往具有某种“中程”（middle-range）性质的议题下寻求对更多因素的局部性综合。后一种情况也许最好地体现在三位最重要的冷战史领袖莱弗勒、霍根和文安立各自的巨作之上。在对传统的权力、政策、外交和国家之类的概念和问题保持持续关切的同时，这三项研究都发掘牵连繁多、观照深广的问题

①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 pp. 501–502.

② 如把冷战史上溯到1917年的作品，见 Melvyn Leffler, *The Specter of Commun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17–1953*, Hill and Wang, 1994.

③ Melvyn P. Leffler, “Bringing it Together: The Parts and the Whole”, *Reviewing the Cold War*, pp. 52–58.

意识和问题群组，分别探究作为“核心价值”和政策战略框架的国家安全问题、作为国家建构问题的美国“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意在统御和把握冷战与第三世界关系的“全球冷战”，并都有选择和偏重地对经济因素（莱弗勒）、社会因素（霍根）和意识形态因素（文安立）予以更深入精微的开掘探讨。^①这几项研究既不排斥外交史，也拓展和超越了外交史，同时有力地呈现了冷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文安立在多元化状况和综合诉求之间表达了一种兼顾态度和中间路线。他在对研究状况予以总结把握的基础上指出，在对冷战史加以整体性和排他性的解释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可能重新塑造对冷战的认识的极有潜力的研究“范式”（非排他性的“解释类型样式”）值得予以特别重视。他郑重推荐了三个这样的“范式”：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和第三世界。这些问题与其他研究议题之间都有较强的“关联效应”，关乎冷战时期东西方政治冲突与人类社会其他变化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涉及与冷战密切相关的大规模和长期的变迁。^②

从作者相对熟悉的研究领域出发，在这里也许还可以给文安立著名的“三个（可能）范式”添上另外两个。其一是冷战和社会科学的关系，这是

^①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Michael Hogan,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 - 19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该书原版于2007年)。莱弗勒对“国家安全”作为研究路径和旨趣的阐发,见 Leffler, “National Security”,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p. 123 - 136.

^② Odd Arne Westad,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Fall 2000, pp. 551 - 565.

一个由一群青年学者开掘并仍在兴旺成长的领域。^①该领域的研究敏感于专业化学术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共生关系，也显示了科学史研究中“外史（external history）”取径和知识社会学观念的影响。可以理解，由于战后现代化理论运动异常丰富的知识社会学、“知识政治学”含义，以及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总体政策（发展援助和发展指导）主要由社会科学家定义和塑造的明显情况，这方面的研究多数集中在战后现代化/发展理论对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行为的影响方面。该领域的研究还有效地关联了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意义，也深入讨论了第三世界在冷战中的作用和命运，尤其有力地照亮了冷战作为“现代性的两个高级版本”之间的冲突的特性。^②社会知识的形态、生产方式和作用已是当代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冷战史和社会科学史相结合的研究当可望对此继续作出独特贡献。

① 如 Nick Cullather, “Development? It’s History”, *Diplomacy History*, Vol. 24. No. 4, Fall 2000; 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中译本见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Nile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vid C. Engerman, Niles Gilman, Mark H. Haefele, Michael E. Latham, eds.,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Ron Robin, *Cold War En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David Ekbladh, *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Michael E. Latham, *The Right Kind of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Cornell,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等等。关于相关研究的综述评析，见 Joel Issac, “The Human Sciences in Cold War America”,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0, No. 3, 2007, pp. 725 - 746; 翟韬：《现代化理论与冷战政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北大史学》第1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9—400页。

值得指出的是，这方面的讨论在国际关系史以外早已展开并持续进行，因而是一个国际关系史和社会科学史之间密切互动的领域。如见 Robert A. Packenham,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deas in Foreign Aid and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Irene L.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Col.: Westview, 1985; Noam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Christoph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Christopher Simpson,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 - 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文安立是这种看法的有力发言人，而他在对美国、苏联政策行为的意识形态基础的考察中都引入了对社会科学因素的考察。尤见《全球冷战》，第26—33页，第379—384页。

另一个综合和关联效应更高，但研究相对薄弱的议题是冷战中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 或 state-formation）”问题。国家是现代世界的中枢制度之一和最主要的权力集成机制，国家的形制和特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在持续的变化当中，而冷战对参与各方的国家体制产生了巨大深刻的改造和塑造作用。^①传统外交史自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但实际上它的一大讽刺正是它把国家作为不言自明的自在之物而不措深思，对理解国家难说有什么独到贡献。1980年代中期以来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新比较政治经济学都对国家建构问题予以持续关注，^②影响波及其他多个领域；而历史学中的重要人物也早已发出深入研究美国国家扩张进程和影响的呼吁。^③迈克尔·霍根以其巨作开辟了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创生的研究，政治学家弗雷德伯格（Aaron Friedberg）也从自己的角度探究了美国“冷战国家”的历史特性。^④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显然没有得到与其重要性相称的重视和大型研究的跟进。^⑤正如霍根和其他人的研究所显示的，“冷战国家”的构建和运作与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社会史、经济史、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均密切牵连。不仅美国，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日本和西欧的国家体制及其演进都与冷战相关，而且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构建和政治经济体系的演化进程也与冷战向第三世界的扩散进程多有重合，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意义重大。总之，国家问题以其特别的重要性和学术关联效应，成为冷战史中有待深入开发的领域

① 关于美国“冷战国家”问题的简要阐发，见 Ernest May, “The U. S. Government, a Legacy of the Cold War”, Michael Hogan (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ts Meaning and Impl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17–228。另见牛可：《冷战史中的“国家安全体制”问题》，《北大史学》第14辑，2009年，第229—257页。

② Peter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另参见贾恩弗兰科·波齐：《国家形成理论》，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李雪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104页。

③ William E. Leuchtenburg, *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e in America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3, No. 3, Dec., 1986, pp. 585–600.

④ Hogan,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1954*. Aaron L. Friedberg, *In the Shadow of Garrison State: America's Anti-Statism and Its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对这方面研究部分作品的述评，见 Andrew D. Grossman, “The Early Cold War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Recent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5, No. 3, Spring 2002, pp. 471–483.

⑤ 少数例外之一是：Douglas T. Stuart, *Cre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History of Law that Transformed Americ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之一。

2010年出版的《剑桥冷战史》提供了当前冷战史研究壮阔阵容的一个权威检阅台。一个多世纪以前剑桥世界现代史书系创始之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表达了一种典型反映当时历史学“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信念的展望：随着档案资料的完整获取和充分研究，历史知识终将达成确定性和完整性的“最终阶段”。而在《剑桥冷战史》中，双主编之一文安立则以一种对21世纪初的认识论和学科文化立场对阿克顿做出回应：随着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学家群体的多元化，“历史知识变得更少确定性了，同时相互冲突的各种历史解释的空间也都更宽广了”。《剑桥冷战史》所代表的新冷战史“远远超越外交事务的狭隘边界”，它“在研究取径上的目标是全面的、比较的和多元论的”，它拒绝“教规性的（canonical）”和“霸权性的（hegemonic）”认识论和知识生产方式，要显示“各种不同的解释和研究路径的存在”。^①有学者显然从更传统的学科特性观念出发，对该书乃至新冷战史整体的“方法论和智识多元主义”及“去中心化”提出指责，认为“冷战”概念过度扩张导致冷战定义的模糊和分析精确性的丧失，导致“冷战”成为廉价的标签。^②但在更宽阔的学术史视野中我们可以看到，智识多元主义和扩张的冷战观在学术史上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多种取向和背景的研究在发现了冷战史和世界历史的多个面向、多重层次后形成的一种思想潮流，也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史新学科文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潮流中，关于冷战的问题意识和具体研究在向着旧的学科观念所不能容纳的更宽阔、更丰富、更深刻的多个方向推进，而不能包容多样性、复杂性的精确性和确定性已不再是这个研究领域里的领袖人物和大多数成员的智识伦理和学术追求。

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在1963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演讲中说，克利奥的大厦“确实很宽敞”，它“拥有、也必须拥有很多房间”，各种议题、各种智力兴趣都应该找到它的住处。^③用这个隐喻状述美国历史学的半个

① Odd Arne Westad, “The Co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xv - xvi, pp. 1 - 2.

② Holger Nehring, “Review-Article: What Was the Cold War?”,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7, No. 527, p. 949.

③ Crane Brinton, “Many Mans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9, No. 2, January 1964, pp. 309 - 326.

世纪的大势，的确再恰当不过了。1990年代以后，历史学的次级学科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经过批判和反思跟进了历史学的总体趋势，也成了“拥有很多房间的大厦”。《剑桥冷战史》显示，新科学文化之下的冷战史已经呈现出的基本样貌也是一个“拥有很多房间”，而且还在不断增建新的“房间”的“大厦”。

在冷战前期进入高峰期的外交史具有单一、封闭、板结的总体特性，这种状况在1980年代以后持续推进的具有“学术运动”风貌的学科批判和反思中被打破，导致以认识论多元主义、跨学科和研究空间扩展为方向的学科整体转型，促生了新的、更趋近美国历史学整体趋势的研究格局和学科文化。“新冷战史”的基本特性是对常规外交史的超越和扩张的冷战观，它的存在和演进以多元主义的新学科文化为基本智识条件。“冷战拒绝任何单一的主导框架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上、在议题和面向上，“冷战”的概念都被极大地扩充了，“全球冷战”和“总体冷战”成为扩充了的冷战观的新标签。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郟城县共经历了三次动员参军运动。为了完成动参任务，各地乡村干部“威胁拉拢利诱”，几乎是动用了软与硬的各种手段与办法。硬手段。有的乡村干部直接“强迫命令”，如不愿去就要抓起来；有的吊打，有的“熬老鹰”（不准睡觉）。软办法。有的地方用抓阄、抽草棒的办法，谁抓到、抽到谁去。有的村则“单纯抓坏人”，即把成分不好人家的子弟送去当兵；有的以“改为好成份”（如原是地主或富农而改为中农等等）为交换条件，劝诱其子弟参军”……有的乡村干部“用妇女欺骗”，即承诺给参军者“说老婆”。有的则用“物质的收买”……。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侯松涛

到元山后当地部队欢迎我们。当时元山机场有一个空军大队。都准备好了我们的兵营。一进兵营看到比在中国时干净舒服的环境，让我们很满意。也不知脱不脱鞋，就躺着睡。早晨戴中星两颗的朝鲜人民军军官和另一名军官，边踢我们边喊：“都什么时候了还睡。”我们盯着那傲慢的军官。他说：“看什么，赶紧全部起床。”原来他是指挥中队中队长。他一看我们穿衣服就出去。这时连长大喊：“打他们。”原先就被激怒的我们追着他们使劲打。后来我们担心被调查，但结果却没有调查。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近现代史部研究馆员徐龙男：《朝鲜战争中转入朝鲜人民军的中国朝鲜族参战军人采访录》



ISBN 978-7-5012-4731-8



定价：38.00元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No. 17 (Summer 2014)

Contents

Introduction

Invited Discussion

Transcending Diplomatic History: From the Movement of Critiquing Diplomatic History to the Rise of New Cold War History / Niu Ke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from the angle of disciplinary culture, the general trends of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eld of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It seeks to reveal the historiographical geneses and intelle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cent scholarship of the so-called New Cold War History. Prior to the 1970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in its booming stage bore characteristics of monotone, parochialism, and disciplinary monolith. From the 1980s onward, the everlasting self-criticism and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which amounted to a kind of field-wide academic movement, led to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field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disciplinary culture, with epistemological pluralism, transdisciplinarity, and expanded space of research as its salient intellectual traits. This new disciplinary culture, which represents an eventual convergence of the field into the main stream of historical studies, paved

the way for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which re-conceptualized the Cold War in an expanded way and went far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diplomatic history.

Young Scholars’ Forum

“Halter” and “Imperialism”: The Reflection of the Korea War in the Villages of China (1950—1953): a Stud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ancheng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Hou Songtao

Abstract: After the Korean War broke out, Chinese villagers’ cognition and reaction consisted basically of “unfamiliar Korea,” “strong America,” “terror of war,” “incomprehensible ‘Resisting the U. S. and Aiding Korea’.” Because the propaganda for “Resisting the U. S. and Aiding Korea” and the mobilization for army recruitment arrived in the villages simultaneously, an equation of “Korea War = Resisting the U. S. and Aiding Korea = mobilization for recruitment = war” took shape in the cognition of the villagers, which in turn became villagers’ rejection and fear of war. Thus, the villagers’ cognition and reaction based on survival instinct, penetration by state power of the village society and adjustment of actual work skills, village cadres’ tricks and maneuvering in between for fulfilling the tasks from their superiorities, distortion and dismemberment by rural traditional logic of state national power, and so on, all were facets of the recruitment mobilization in villages during the Korea War. In the process villages and the state negotiated, contested, and compromised. The consequences were by no means a simple story to be qualified as either “magnificent” or of “gloomy.” Rather, this is a multilayered history of acts in front and behind the curtain.

British Policy for Restraining Trade with Taiwan, 1949 – 1953 / Song Liang

Abstract: Around the years of the Korea War, a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amps under the USA and the USSR was taking sha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used economic weapons to realized trade restrictions against the